

錦云天子

謝豐選



申春 / 謝謀 / 謝談 / 編

謝豐詩文選

中國文聯出版社

目 录

第一辑 文论、散文、回忆录

抗日救亡话沧桑

——回忆 30 年代在北平从事革命活动的经历 (3)

风雨同舟话当年

——胡正英同志革命生涯片断 (11)

关于“反帝拥苏同盟”的革命活动 (21)

山西十二月风云 (32)

1942 年 5 月“反扫荡”斗争中的英勇事迹 (46)

太行青山埋忠骨

——怀念张秀中同志 (54)

挺进大别山 (68)

在弹音的岁月 (74)

雪夜突围

——记一位干部死里逃生的故事 (93)

巫山战斗

——悼念几位战友	(102)
小溪遭遇战	(111)
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	
——欢迎志愿军归国代表到达武汉	(116)
巩固战果 继续前进	(119)
认真贯彻群众化地方化的办报方针	(124)
一年来的朝鲜战争说明了什么	(128)
必须检查抗美援朝运动的实际效果	(133)
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几个问题	(139)
搞好控诉运动 订好爱国公约	(147)

布达佩斯的炮声

——回忆“匈牙利事件”	(151)
冤案是怎样造成的	(161)
回顾与展望	(178)
团溪中学校史碑文	(181)

第二辑 诗 词

满江红·重越娄山关赋	(187)
满江红·经历山西十二月风云感怀	(188)
1942年5月“反扫荡”斗争	(189)
挽 联	(190)

艰苦岁月

——忆大洪山一段战斗生活	(192)
沁园春·南征抒怀	(194)
浪淘沙·飞华沙有感	(195)
满江红·勉谈儿	(196)
浪淘沙·庆祝建国二十周年	(197)
沁园春·颂庄严声明	(198)
临江仙·赞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斗争	(199)
浪淘沙·从长沙到韶山	(200)
沁园春·观瞻毛主席旧居	(201)
满江红·观纪录片林县“红旗渠”	(202)
浪淘沙·赞“红旗渠”重点工程	(203)
满江红·听巴桑忆苦报告	(206)
沁园春·周总理访问越南	(207)
沁园春·忆“文革”十年	(208)
悼亡妻彭永静同志	(210)
浪淘沙·挽亡妻彭永静	(211)
咏 史	
——叹李自成的败亡	(211)
咏潼关	(212)
沁园春·登黄鹤楼感赋	(213)
悼张秀中同志	(214)
浪淘沙·游黄鹤楼	(215)

浪淘沙·喜澳门回归 (216)

第三辑 纪念文汇

谢丰传略	申 春 (219)
忆父亲	谢 谋 (224)
“黔北书店”始末	申 春 (230)
怀念母亲	谢 谭 (233)
采桑子·中秋	谢 谈 (236)
拉 练	谢 谈 (237)
咏 志	谢 谈 (237)
生日抒怀	谢 谈 (238)
魂归那山那水 ——沉痛悼念谢丰同志	申 春 (239)
后 记	编 者 (243)

第一辑

文论、散文、回忆录

抗日救亡话沧桑

——回忆 30 年代在北平从事革命活动的经历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千里河山很快沦亡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尤其是青年学生反映更为强烈。当时，有 10 万北平大中学生到南京请愿并示威游行，要求南京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打倒外交部长王近廷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我当时在南京成贤街一带亲眼目睹大批军警用警棍、水龙头，甚至开枪镇压学生的爱国行动，将死难的学生从珍珠桥上抛尸秦淮河之中。

1932 年上海“一·二八”战争爆发后，由于十九路军的英勇作战，迫使日寇侵略军三易统帅，三次增兵达数万人也难越雷池一步，但终因南京政府的腐败无能投降出卖，畏敌如虎，迫使十九路军从前线撤退下来，换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守卫上海，竟然与日军签订了可耻的城下之盟“淞沪停战协定”，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终以失败结束，但“一·二八”战争的炮声，震撼着南京政府的大小老爷们的“黄粱美梦”。他们惊

惶失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以为皇军即将打到石头城下，再也看不到秦淮河上的画舫，夫子庙的红灯绿酒、豪华饭店的舞乐伴奏下的“华尔兹”了。到处充满离愁别绪，携带一家老小依依惜别经营多年的安乐窝，向武汉、广州等地逃难。“钟山苍黄起风云，南京政府唱空城”，这就是当时最真实的画像。

我困守在南京已经一年多了，原准备考大学的梦逐渐幻灭。亲眼看见南京政府丧权辱国，镇压爱国学生的种种罪行，义愤填膺，报国无门，当我陷于极端苦闷之时，我的同乡同学约我到北平去，我便于1932年7月，离开南京到了北平。

当时，北平抗日救亡的政治空气极为浓厚，青年学生在校内校外非常活跃。在东、西安市场的书摊上出售各种抗日救亡的进步书刊，我见到许多人在那里围观争购。我在北平的贵州籍同乡、同学不下几十人，他们大都参加了不同的革命团体，有少数已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或中国共产党。我在他们的影响下，很快由肖之亮介绍，于当年9月加入了党的外围团体“北平剧联”。不久，我经肖之亮、陈沂同志的介绍，于1932年12月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实现了我多年来寻求人生正确道路的愿望。工作积极性很高，不怕艰苦地去完成党组织分配的任务。尽管住在简陋的公寓里，饥一顿饱一顿，为了党的事业，有时在大风雨中奔忙，然而心情舒畅，乐在其中。

我们那时先后公开组成了“新球”、“北新”等剧团，经常到学校或剧场、电影院去演出，内容主要以抗日救亡运动为中

心，向广大市民、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呼吁停止内战、全民团结共同挽救民族危机。我们的活动受到广泛的支持和欢迎，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却遭到反动当局的仇视，下令禁止剧团的活动。有时当我们正在舞台上演出中，剧情发展到高潮，忽然警察赶来横加干涉，被迫中断演出，观众纷纷表示愤慨，在一片谩骂声中退场。

1932年11月7日，是俄国十月革命15周年纪念日，经过事前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我们届时到清华大学礼堂演出，内容相当丰富，有集体唱抗日救亡歌曲、有赞扬“十月革命”的诗歌朗颂，有短小的话剧、活报剧等节目，一千多观众常常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热烈祝贺演出成功。当节目行将结束，学校当局以为还有精彩内容有点按奈不住了，公然假借北平市政府的名义，不让再继续演下去，台上台下高呼口号不欢而散。我们剧团一行30余人从礼堂出来经过一个工地，那里有上百的建筑工人修建一幢宿舍楼，他们正在抽烟、喝水、休息闲谈，我们见机不可失，立即排队给他们唱歌，并表演了几个短小的节目。有的同志还向工人们宣传红军在江西反“围剿”的胜利，他们频频点头、微笑，依依不肯散去。在工头的强迫下才重返高楼继续施工。在夕阳西下，时近黄昏时，我们上了租的那辆大卡车在一路歌声中向城内开去。在北平城内，我们有时也利用那些黄包车夫在马路边或胡同内的树荫下，同他们交朋友，谈家常，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相机向他们作些日寇侵占东北，虎视华北，而反动当局都惧怕外敌、勇于内战的宣传，

而这些活动虽说收效不大，但泰山之高，不计微土；东海之深，不择细流，事物都是由小变大，由低增高的。

1933年春节过后，一天晚上，一位姓周的同乡同我密谈，说他要到门头沟矿区深入生产第一线，与煤矿工人一起劳动，这是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锻炼自己最好的地方，也是无产阶级战士不怕艰苦的表现，他约我同去，因我投身革命行列不久，有关这方面知之不多，未作仔细考虑便同意了他的意见。一天下午，我们从西直门搭上火车，到了门头沟下车后四处了望，到处是煤堆成山，工人们栖身的低矮破烂的宿舍，散落在山上山下。在一些煤窑洞口，运煤车进进出出，工人们正在采煤。我俩既无介绍信，又无熟人，在工地转了一圈，夜幕临近，大地苍苍茫茫，无处栖身，颇有天涯沦落之感，后来总算找到一间小窝棚，一个老工人正在炉边取暖，一面抽着旱烟，一面在熬一锅小米稀饭。我们闯了进去，把来门头沟的意图告诉他，他哈哈一笑，笑我们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原来既没人介绍，又不认识矿长、工头，怎么能当工人。再说，就当了工人，下井采煤那样的重活，你们两个文弱学生也吃不消。还有矿警很坏，常在这里搜查“危险分子”。如不认识矿上的人，被矿警发现定会找麻烦的，还是明天搭早班火车回城为好。我们很感谢老工人的善意，并求他给我们一碗稀饭，算是晚餐了。我们围炉坐了一夜，天明告辞，悄然离去。后来我才知道，那位同乡是犯了严重错误，被撤销了工作，为表示改正错误到煤矿当工人改造自己，但他事前并未如实告诉我，如果我早知此中真

情，我是不会白跑一趟的。

王明于 1931 年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后，他为推行所谓的“国际路线”，使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推行他那一套“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在全国强制贯彻，影响所及，北平地下党组织亦难幸免。虽然，当时日寇侵略已从关外逼近关内，华北时局空前危急，爱国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一直处在高潮之中，特别是在大城市里，敌我力量对比又很悬殊，本应采取隐蔽精干的斗争策略保存党的力量，利用各种公开合法的斗争方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然而，在“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采取了一些“左”的斗争形式，使革命力量蒙受了巨大损失，如利用“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十月革命”等重大节日举行集会，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在北平的东、西长安街、东四、西四、天桥等繁华闹市街头，或高呼口号、或当众讲演，常与反动军警发生冲突，把我们手无寸铁的同志暴露在敌人面前。有的被打伤，有的当场被捕，导致革命力量的削弱，而执行“左”倾路线的领导同志既不吸取斗争失败的教训，甚至还到现场督战，“左”倾路线造成的损失，真是罄南山之竹，亦难尽书。

我于 1933 年 3 月的一天，北平剧联的负责人向我介绍一位名叫黄进的人，他住在宣武门内顺城街一家公寓内，那位负责人要我与他联系，只说他也是“剧联”成员，却未讲清他的来历，而我当时年轻，又缺乏社会经验，对一个人的好坏不加

考虑，只片面地相信领导。不几天，我去见到黄进，一个瘦小的个头，才知他是江苏太仓人，在一所大学进修，初次见面持谨慎态度，话不多，唯唯诺诺，看不出他是好是坏，而他很善于伪装，工作表现积极，但我逐渐发现他一些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第一，我交给他一些上级发下来的宣传品，促他尽快设法散发出去，他竟然编造谎言说已利用几个夜晚到一些胡同从居民门缝把宣传品塞进去完成了任务，而我却发现那些宣传品原封未动压在他的床席下，所谓“完成任务”是假，他欺骗人是真。

第二，我发现与他交往的人均以国民党的人为多。例如，有一个名叫王××的从上海来北平准备到北平市党部工作前就住在他那里，王某穿着很阔绰，常邀他到饭馆大吃大喝，自称是私立民国大学校长鲁荡平的学生引以为荣，而鲁荡平则是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执委，是个反共专家。

第三，他自称是民国大学的学生，却很少见他去学校上课。据我所知，当时民国大学的革命活动开展很好，学生会常常召开时局问题座谈会，讨论大家关心的国际国内形势，并举办哲学、政治经济学专题讲座，邀请侯外庐、施复亮等知名教授讲演，特别是施复亮的讲演深受欢迎，他对马克思的《资本论》颇有研究，阐述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经济危机，最后必然导致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等理论，他讲解通俗易懂，十分叫座，前往听他

讲课的学生非常踊跃，大教室容纳不下，连教室两边过道都挤满了人。每次讲座黄进都参加了，而我有意观察他的行动，我发现他并不认真听讲，而是东溜西串偷看别人记录，就在讲座过了几天，传来民国大学进步学生突然失踪的消息，我想，学生失踪与黄进的活动有何关系？也多少看出黄进反常活动的蛛丝马迹来。我曾向有关领导汇报过这方面的情况，我认为黄进是一个“特殊学生”，他伪装进步，暗中搜集进步学生的材料，到他的主子面前去邀功，捞取一点报酬。

第四，有一天，我看他，看见他正同一个女人在争吵，那女人见我进屋，就哭泣而去，我问黄进是何原因？黄进说，那女人和他存在恋爱关系，已同居并怀孕了，女方要求正式结婚。后黄进为避免那女人上门纠缠，便偷偷从公寓搬到“江苏太仓会馆”去了，单从这个问题可以看出，黄进确实在玩弄女性，道德败坏。

从此，我对黄进的行为更加怀疑和谨慎起来，既不给他看文件，又不和他交谈重大问题，和他的来往逐渐减少。不久，果然发觉他的极不正常的表现，为了摸清他到底想干什么，我向领导进行了汇报，领导指示要我设法稳住他。1933年7月5日下午4时左右，我按事先约定的时间到“太仓会馆”找黄进了解公演话剧情况，交谈不过半小时，突然闯进来三个便衣特务，举起手枪，宣称逮捕我们，对黄进住处作了草率的搜查后被押解出了“太仓会馆”，朝宣武门方向走去，再往北到了西长安街南侧一胡同内一处小院，那里是特务的宿舍，也是逮捕

政治犯的初审之处，我们在那里只作了姓名、籍贯、职业之类的询问和登记，当晚把我们押往西城区警察分局关押，特务把黄进留在特务宿舍过夜，这其中自有奥妙。第二天上午，警察又把我押到特务住所，我刚进屋，三个特务凶相逼人，硬要我交代革命活动情况，上面的领导人是谁。我知道，黄进早已把我出卖了，我拒不承认，严正指出这是对我的诬陷，特务们见我坚不吐实，便从另一房间叫出黄进面对面指证，黄进公然说：“谢是剧联的书记，区委宣传部长”。由此可见，同时被捕后在敌人面前出卖同志，出卖自己的直接领导，是地地道道的叛徒。黄进不仅是一个叛徒，而且是一个混入革命组织内部的奸细。

黄进在北平叛变后，他再也混不下去了，据说他到了上海，一位与我在北平剧联工作过的好友告诉我，他在上海街头见过黄进，抗日战争爆发后，黄进又混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作一般事务性工作，上海失守后，又曾在武汉见到黄进和一个女人漫步街头。

我被黄进出卖后在狱中半年，经亲友力保获释，我出狱后住在亲戚家中，他们对我有监督任务而不能随便出门，我便利用这难得的机会，闭门读了大量的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刊和文学作品，为后来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风雨同舟话当年

——胡正英同志革命生涯片断

1934年秋，经朋友介绍，我与胡正英同志相识于北平。他当时住在西城民国大学附近一家简陋的公寓里，准备投考大学进修文科。他毕业于贵州遵义省立第三中学，由于他勤奋自学，新旧文艺书刊读过不少，因而知识面较广，考大学文科问题不大，而数理化、英语等方面则感不足，似难过关。他正彷徨苦闷之时，我们在北平萍水相逢，又是同乡，他与我弟弟谢树中又是先后同学，所以谈起来很相投，真是一见如故。

那时，我被捕保释出狱后住在亲戚家，行动上受到一些限制，生活常感不自由，在这样环境下，深感个人的理想无法实现，早有离开北平的打算。我与正英同志交往中就此类问题交换意见，他很同情我的一些想法，对他考大学一事，也多次认真研究，作过慎重的考虑。我们认为：北京大学文科水平较高，假如考取可学到“一点东西，但能否考取则无把握。其余私立大学有的文科办的不怎么好，只要能交纳学费，躺在床上睡大觉，届时也可拿到文凭，这样还不如自修，同样可以“无

师自通”。而当代许多文学家，有几个有大学文凭的，还不是由于艰苦努力，又经历了丰富的社会生活，然后写出了不朽的文学篇章嘛！从此，胡正英同志决心放弃投考大学的心愿，走自学成才的道路。他天天坚持记日记，偶尔也试写一些文艺作品，记得他曾以家乡所见妇女生活现状和妇女解放问题写过一篇文章投给《世界日报》副刊，居然给发表了，处女作的发表，他几乎高兴得跳起来，且增强了继续努力自学，向文学高峰攀登的勇气和信心。

不久，我违反亲戚的意愿，搬出来与正英同志住在一起，我除提供不少文艺书刊给他阅读外，还提供一些进步的社会科学书刊，他读起来颇感兴趣，对帮助他重新认识世界、认识社会、中国当前现状、确立正确的人生观，有很大的启发，逐渐把个人的前途同中国的前途联系起来，打消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进而从个人打算的狭隘范围跳出来，展望世界的未来，关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我们相商，决定共同返回遵义老家，干一番对人民有利的事业。并且由他先回去，为我筹一点路费，我稍后启程，在他离北平前，我陪他一起，先后游览了故都一些名胜古迹，特别是香山，时值深秋，枫叶如醉，我们慕名而往，只见游人扶老携幼，欢声笑语，雅兴甚浓。我们是步行而去而回，归途中虽疲劳不堪，然而登名山，观秋景，赏红叶，余兴无穷，各赋诗一首，以记此游。正英先成：

萧萧田野已深秋，漫步香山竟日游。
俯拾红叶东归去，潦倒书生学风流。